

中 掙 扎

——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

冯崇义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抗日战争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桧林
副主编 江 淳 侯样祥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则勤	门立军	王桧林	江 淳
刘建业	乔还田	李良志	杨圣清
武月星	林治波	侯样祥	郭德宏
解学诗			

抗日战争史丛书续编·综合系列

国魂, 在国难中挣扎

——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

冯崇义 著

责任编辑: 杨 华

封面设计: 林胜利 赵子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 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625 插页: 2 字数: 191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一版

199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册

ISBN7—5633—2161—6/K·064

定价: (平) 11.80 元

(精) 17.30 元

《抗日战争史》丛书

总序

和洪志

在本丛书编委会的同志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及广大从事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抗日战争史》丛书陆续出版问世了。这是我国学术界、出版界为推动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实事求是地向广大读者展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之全貌,以实际史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做出的有益尝试,是很有意义的。对此,我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抗日烽火的老战士表示衷心的祝贺。

翻开中国近现代史,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后的100多年的历史,既是一部中国人民的血泪史、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奋斗史、胜利史。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受尽侵略、凌辱、欺压,甚至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同样,正是在这受尽侵略、凌辱、欺压的100多年里,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反抗阶级压迫,曾进行了可歌可泣和波澜壮阔的斗争。但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之前的所有斗争,并没能使中国人民摆脱被侵略、被掠夺、被奴役、被压迫的悲惨地位,只有到了抗日民

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反帝斗争才由失败转向胜利。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的顽强斗争，中华民族终于取得了彻底打败外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创造的惊天动地的伟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

中华民族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是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伟大胜利，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对日本法西斯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消灭、抗击、牵制了大量日军。这不仅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大陆的彻底失败作出了伟大贡献，而且也有力地支援了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减轻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为早日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整个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牺牲之重、作用之巨，是举世瞩目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为了使广大青少年和后来人更加了解这段历史，编辑出版一套全面反映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浴血奋战、英勇牺牲，为国家、为民族、为世界人民立下不朽功勋的历史的丛书，对增强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自强不息精神，对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对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将大有裨益。

这套丛书不仅以大量篇幅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所取得的卓越成

就,而且对广大爱国的国民党官兵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也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和论述;不仅直接阐述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而且对海外华侨、国际爱好和平人士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力支持与贡献也作了叙述;不仅对社会上层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作了如实阐述,而且还把视线瞄准了广大基层人民;不仅重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而且还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学术、思想和文化等也作了介绍,力图使读者能全方位、多视角、多层次地来了解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全貌。无疑,这对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促进学术发展和繁荣是很有作用的。

1992年6月

编辑说明

抗日战争是近代 100 余年来中华民族首次打败外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在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海外侨胞团结奋斗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热情支持下取得的。中国人民在抗日最前线浴血奋战，英勇牺牲，为国家、为民族，也为世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了全面反映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之概貌，确立中华民族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促进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学术进步与繁荣，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们编辑了这套丛书。

这套丛书是一套学术丛书，丛书规模在 50 种左右。选题范围，时间上始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迄于 1945 年 9 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内容上包括“政治系列”、“经济系列”、“军事系列”、“外交系列”、“人物系列”及“综合系列”等。从 1992 年开始陆续出版，到 1995 年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全部出齐。

本丛书的编辑方针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贯彻忠于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为研究对象。既要反映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又要反映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相互关系；既要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抗战取得胜利的卓越贡献，又要反映国民党中央统帅部和广大爱国官兵对抗战的贡献；既要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状况，又要充分展示此一时期中国的社会、

学术、思想、文化情况；既要反映当时决策层的情况，又要反映广大基层人民的情况，等等。总之，我们试图全方位、多视角、多层次地来考察抗日战争，将抗日战争的全貌展示在广大读者面前。

本丛书在编纂体例上，既照顾丛书的完整性，又兼顾各专题的相对独立性，尽量做到点面结合。在学术观点上，尽量照顾、尊重各作者个人的观点，不做统一要求，只要论从史出、逻辑严密、自圆其说、利于学术之发展与繁荣、符合本丛书的主旨，我们即予承认。

本丛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关照。身经抗日烽火、杨得志将军为本丛书作了序，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专家学者等都关心着本丛书的问世，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对本丛书的编辑出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这样，才使本书在政治上、学术上更加全面、完善、健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为本丛书的出版付出了十分艰辛的劳动。在此一并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

《抗日战争史》丛书编委会

1992年6月

导 言

本书将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放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总体格局中来审视，力图把握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整体精神气象和中国现代文化思潮在抗战时期的大趋势。我们所得到的是一幅悲壮与凄怆、辉煌与阴暗、清醒与困惑相互交织着的斑斓图像。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是“世界化”，那么，抗战时期的时代精神便是“中国化”。中国现代文化从五四时期到抗战时期，便是沿着从“世界化”到“中国化”的路向发展。这是一段悲怆的回归之路：它既意味着中华民族的觉醒，也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困惑；既意味着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事业中的奋发，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在现代化事业中的挫折。

众所周知，文化上灿烂辉煌的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当时中国新知识界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他们在那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会中掀起了以文化改造为核心的社会改造运动，站在历史的前头激扬文字、指导潮流。他们心潮澎湃，但并未因高度亢奋而丧失理智；他们密切关注人生、社会和政治，但并未被社会政治的漩涡所淹没。他们是在一种相对沉静的心境下、在一种相对独立的地位上来指导历史潮流的。由于有这样的地位和心境，当时的知识分子能够相对坦然地面对社会现实与人生意境，相对冷静地思考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他们发现，有着辉煌过去的中华民族悲惨地落伍了，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无论是制度还是观念，都远远落后于以西方现代文明为代表的世界水平。因而，他们认

定，要拯救中国的命运、复兴中华民族的辉煌，唯一的出路便是彻底改造中国文明并将她提升到世界水平。用时下流行的术语说，便是要使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接轨”，并与世界文明“一体化”。五四时期的三大思潮，即反传统思潮、民主与科学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目标都是指向“世界化”。

在纪念五四运动 20 周年的时候，于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启蒙战士张申府指出：“五四运动一个最大的特色，可以说就是开放。”^①的确，在探讨中西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前途等方面，“五四的一代”具有非常开放的心灵。他们的思想之活跃与气度之恢弘，在中国历史上唯有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子可与之比拟。“世界化”正是开放心灵的追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自发动这一运动伊始，就高举着“世界的而非锁国的”^②大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他主将们也都高举着这面大旗。正在步向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大声疾呼：“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③对中国国民性具有最深刻认识的思想家鲁迅深沉地呐喊：“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④对西方文明有过深切体会的胡适果敢地断言：“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是再造文明。”^⑤而且他认为新思潮要再造文明的主要手段是从西方“输入学理”^⑥。

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生辈，对“世界化”的渴求更为热切，也更少精神负担。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学生刊物《新潮》所关

① 张申府：《五四的回忆》，《什么是新启蒙运动》，生活书店 1939 年版，第 21 页。

②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1 号。

③ 李大钊：《青春》，《新青年》第 1 卷第 2 号。

④ 鲁迅：《随感录》三十六，《新青年》第 5 卷第 5 号。

⑤⑥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第 4 卷。

注的四大问题是：“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于若何阶级？第二，现代思潮本何趋向而行？第三，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如何？第四，以何方术纳中国于思潮之轨？”因而，《新潮》创办者们的全部心思正是要使中国走向世界，“导引此‘块然独存’之中国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① 在广大青年学生中极有影响的另一刊物《少年中国》，在追求“世界化”方面与《新潮》完全一致。该刊的主办人王光祈从世界文化的角度来确立“少年中国”的方位与前途：“我是一位梦想世界大同的人，我将中国这个地方，看作世界的一部分……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就是要使中国这个地方——人民的风俗制度学术生活等等——适合于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而且配得上为大同世界的一部分。”^②

五四时期的“世界化”思潮如同排空巨浪，锐不可挡，连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也被裹挟于其中，以至于眷恋中国文化的梁启超、梁漱溟等人也深为“世界主义”的情怀所打动和感染。他们当时致力于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但其着眼点不是要“保存国粹”，而是要将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提升为世界文化。^③ 可以说，在一切领域，“五四的一代”都以“世界化”为时尚。“德先生”、“赛先生”、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新村主义、互助主义、马克思主义、数理逻辑、相对论、心理分析，等等，任何西方的学术和思想都在引进、讨论、批判和接纳之列。就连中国字也要使之拼音化以使之与西方语言接近，或者干脆提倡“世界语”。那确是一个“世界主义”盛行的时代。

可是，好景不长。当我们将眼光投向 20 年后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映入眼帘的是迥然异趣的文化气象。这里不再有“世界化”的旗号，不再有担心“从世界人中挤出”的忧惧，不再有

① 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第 1 卷第 1 号。

② 王光祈：《“少年中国”之创造》，《少年中国》第 1 卷第 2 号。

③ 参见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同浴于世界文明之流”的歌唱，有的是“中国化”、“中国味”、“中国魂”、“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国民党官方开动一切宣传机器来颂扬古来中国的道德文章，渲染往日中国的荣耀辉煌，论证“西洋文化”之不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蒋介石在抗战时期的所有演讲与著述，几乎都离不开“中国的固有德性”，特别是在题为《中国魂》、《革命的教育》等演讲和《中国之命运》等著作中，蒋介石更为集中地强调“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必须具有“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品性”。按蒋介石的说法，如果中国人在上述这些方面袭取外国的东西，那就至多也只能算是“皮相上的中国人”。国民党在抗战时期曾发动一场文化运动，即“国民精神总动员”。表面看来，始于1939年3月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陈义甚高，且切合时宜，如“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等三大口号，就很动人心弦。但是，这场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却不过是古来中国统治者惯用的方术。国民党人的根本用意乃是要利用中国的传统道德来将国人的思想统一于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忠”、“孝”这些范畴无论如何翻新，仍旧是中国宗法社会的古董。当时的国民党人，还高唱“民族文化运动”的高调，宣称“在这次文化建设的高潮中，一件使我们可喜的现象，就是大家使文化与民族结了婚，也就是文化民族化。只要回顾一下五四运动时代的文化运动，就可以看出这次的文化运动是怎样地民族化。那时所倡的两种口号，一是‘民主’、一是‘科学’都由西洋抄袭而来”^①。

饶有兴味的是，政治上与国民党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在文化心态上与国民党人颇多一致之处。中国共产党人在追求文化的民族化方面比起国民党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① 李辰东：《六年抗战与民族文化的建设》，《文化先锋》第2卷第12期。

其实，“中国化”这一面旗帜正是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打出来的。中共哲学家艾思奇在1938年4月发表的《哲学的现状与任务》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国化”这一概念，随即就得到陈伯达等人的唱和。^①毛泽东很快就从其哲学助手艾思奇、陈伯达等人的手中接过“中国化”这一范畴，把它写进了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的经典性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②于是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便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题，延安整风运动沿着这一方向而展开，“毛泽东思想”也在这一过程中最后定型。

政治党派和政治领袖们倡导“中国化”，也许难免会夹杂有直接的政治动机。抗战时期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倡导“中国化”，则是他们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文艺界在全民抗战爆发之前就已致力于以救亡为目的的“大众化”、“通俗化”运动。全民抗战爆发

① 艾思奇：《哲学的现状与任务》，《自由中国》创刊号。关于陈伯达的“中国化”主张，参见 Wylie Raymond, *The Emergence of Maoism: Mao Tse-tung, 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81-99.

②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解放》第57期。解放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对这段文字略有修改。

后，“抗战文艺”应运而生，而且“抗战文艺”自始便是充分大众化、通俗化、民族化、民间化的文艺。抗战时期的中国史学界满怀深情地追述中华民族悠久伟大的过去、灿烂辉煌的文化，以及中华民族大家庭团结融合的盛事、数不清的民族英雄抗敌御侮的事迹。战时的哲学界则热切地探讨中国往圣先哲所创发的道、性、理、气等范畴，以及中国所特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新儒家”这一哲学流派也在抗战时期正式形成。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硕学鸿儒还在大后方成立了专以弘扬中国民族文化为目标的书院，诸如以马一浮为首的“复性书院”和以张君勱为首的“民族文化书院”。他们担心“只取欧西文化，忘却自己民族宝藏，则文化本身，陷于惰性，出主入奴，必为西洋文化所征服”^①。

总而言之，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古今中西之争在抗日战争时期便以“中国化”作结。这究竟是祸是福？还在“中国化”运动的极盛时期，著名学者嵇文甫便以这样的程式来描述中国近现代文化的轨迹：国粹论——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中国本位文化论——中国化运动。而且，在嵇文甫看来，“中国化”是中国现代文化论争的“深化”、“醇化”和“净化”，是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争的最完美的综合和总结。他还这样写道：“学术中国化运动，是伴随着学术通俗化运动，或大众化运动而生长出来的……从今以后，这口号将响彻云霄，随着抗战建国运动而展开一个学术运动的新时代。回想以前我们在学术运动上所表现的愚笨或失机，倒觉得有点惘惘然了。”^②

当时中国知识界似乎将“中国化”运动理想化了。外来的思想文化在移植时发生民族化，本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中自然的常轨。而刻意追求民族化，则往往使本土文化中本该抛弃的一些陈规陋习得到袒护，使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未能得到充分的传播与接纳，

① 周祥光：《战时产生的“民族文化书院”》，《民意》第167期。

② 嵇文甫：《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4期。

也使外来思想文化在移植过程中发生太多的变型和附加。

从中国现代文化史发展的具体过程看，“中国化”运动也有其负面影响。首先，这一运动偏离了五四时期那种追求理论的系统性和一致性的精神，助长国人对理论知识以及外来文化采取极端实用主义的态度。轻视理论思维本就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痼疾之一，这一倾向在“中国化”运动中发展到了顶峰。

其次，“中国化”运动姑息了复古主义倾向。光复旧物本就是“中国化”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不难发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扫荡和抛弃的诸多“国粹”，特别是那些千百年来支撑着等级专制制度的陈腐观念，在抗战时期又在“民族化”、“中国化”、“大众化”等旗号下重新得到肯定。忠孝观念、等级观念、专制观念、拜权主义、臣民心理、思想大一统意识等，都是五四时期“民主和科学”思潮所冲击的对象，但它们在抗战时期的“中国化”运动中不同程度地获得了复兴的机会，只不过其外在形式改变为对主义的迷信、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对领袖的神化、对上级的绝对服从，等等。

再次，“中国化”运动助长了排外主义和反现代主义心态。知识分子自身的困惑在这一方面表现得至为明显。自鸦片战争以降，向西方学习以实现中国的近代化或现代化，便一直是先进的中国人的强烈愿望与追求。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这种愿望与追求所达到的高峰时的体现。在五四时期，中国在整体上落后于西方成为多数知识分子的共识。但是，学西方和追求现代化也一直受到保守心理及习惯势力的顽强抵制；而由于中国不断受到列强的侵略和欺侮，在主张学西方和现代化的人们中间，对既是老师又是敌人的西方，对既带来福祉又带来苦痛的现代化，也难免存在着种种疑惑。无论是保守心理还是思想困惑，它们都驱使着中国人去追求“中国特色”，追求“中西结合”或“中西合璧”。问题在于，当中国人对西方文化还所知甚少、输入甚少的时候去强求“中国

化”或“中西融合”，其结果往往会导致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与倒退，至多也只能是低层次的综合。抗战时期中国东南沿海的现代文明中心被毁于战火或沦入日本侵略者的魔掌，这本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严重挫折，而中国人在“中国化”运动中所发展起来的排外主义和反现代主义意绪，则可视那场国难给中国现代化事业造成的内伤。当时国人并未意识到，当他们片面地谴责西方文明及中国中心城市的堕落可恨、颂扬中国农村与农民的纯朴可爱时，他们的灵魂正在从现代向中世纪回归，就像他们当时被迫从城市退向乡村一样。从“都市化”到“乡土化”，从“世界化”到“中国化”，生活行程正好与心路历程同步。

历史发展的进程往往就是进展与顿挫交错，辉煌与悲剧同在。本书所力图刻画的正是这样一种充满矛盾的历史原貌。本书第一章所提供给读者的是抗战时期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或精神气象。笔者既致力于追寻支撑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精神支柱和道德基础，同时也试图描述共产党、国民党、汉奸及一般民众各自不同但都一样复杂的内心世界。从爱国激情到汉奸心理，那五光十色的精神过程比起历史的外在过程更难以捉摸。

第二章意在从中国现代思潮发展的大趋势和中国现代化的总体格局这样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思潮。笔者发现，抗战时期的文化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四思潮的逆转。新启蒙运动在“救亡”与“启蒙”的相互冲突中不幸夭折，政治民主化虽然获得种种特殊的刺激但终未能迈上正轨，文化思潮的主题在亡国灭种的危局中从开放的“世界化”转变成为带有封闭意味的“中国化”，我们不能不为中国现代文化所遇到的挫折而扼腕兴叹，也不能不深思这些遭际的深刻根由。

第三章所要论述的是抗战时期的中国学术。笔者的重点不在于对战时中国学术成就的记叙，而在于学者或政治家们在学术活动中的精神追求，以及这种追求与抗战时期文化思潮之间的联系。

因而，笔者在这里所侧重探讨的是时代精神与哲学路向、历史学的时代阐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对现实的深切关注以及它们从现实获得的反馈。

从第四章到第五章，笔者分叙抗战时期中国文学、艺术与宗教，主旨也是要从这些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中发现时代精神与群体心态。当大动荡中的文人们从文坛走向文摊，教徒们从道场走向战场，他们的脉搏也与时代一起跳动。但是，他们的感触与追求却大不一样。于是，文艺界发出了鼙鼓之音、哀怨之音与亡国之音，宗教界有基督教徒的祷告、佛教徒的悲愤、回教徒的抗争以及其他形式的善男信女们的挣扎。

第六章所探讨的战时中国教育，本也是战时中国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中国的学校教育古来都是将政治和道德教化置于比职业教育更高的地位，即使在与政界并无直接联系的教书先生们那里，“传道”也远远高于“授业”。抗战时期一切都高度政治化，政治道德教化的突出地位也就可想而知。当时在朝的国民党为安邦治国而致力于党化教育，在野的共产党为了一个新的理想而倾其全力于革命化教育，夺得半壁江山的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们为维护其初建的秩序而对中国青少年推行奴化教育。而在那危难之秋，也还有一些钟情于“教育救国”的人们在苦苦地维持抗战与建国并重、救亡与现代化并举的现代欧式教育。